

中國時報 / 1998/01/11

然而，也不過剛剛成為歷史的八〇年代，對性、性別的踰矩者

然而，也不過剛剛成為歷史的八〇年代，對性、性別的踰矩者卻毫不容情。就以新公園遭警察臨檢一事來說吧，當時的「玻璃圈人士」在主流社會的理解下，從「誤入歧途的可憐人」，逐漸被建構成罪惡的化身，而新公園這一淵藪則是亟待警方掃蕩清除的黑色疫區。

相較於七〇年代同性戀的地下化，（男）同性戀者在八〇年代以布滿汗名之姿浮出地表，從變態心理學的一支朝向一小撮異類異形者的偏差行為，既成為醫學論述凝視的焦點（關於同性戀的醫學報告、心理學研究開始出現於坊間雜誌和書籍），其社會處境又與犯罪、影響社會治安畫上等號，變成公權力道德訓育的罪惡主體（警方三天兩頭傳出「捷報」 | 查獲男同性戀酒吧、三溫暖、俱樂部，發現「人妖」若干）。

一九八四年，台灣傳出首位愛滋病帶原者，警察單位對男同性戀聚會場所進一步加強圍剿，對男同性戀社群無異雪上加霜。一九八六年之◆家威公開以同性戀身分現身，成為男同性戀社群與官方醫療體系中介的愛滋病防治義工；次年在◆家威的聯繫安排下召開記者會，四位愛滋病帶原者身穿黃色上衣、臉帶藍色面罩在電視新聞畫面中現身，風聲鶴唳了兩年多的愛滋病，終於有具體的牲品出現，引起社會極大震撼（直到去年「臨界點劇象錄」導演田啓元去世，世人才知他曾參與其中）。